

逃亡

六十年前，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的后期，正在洗衣店学徒的“我”应征入伍。他网罗汉奸，参与缉捕、拷问和杀害敌方谍报人员的行动。

战后，日本国内的联合国驻军四处追捕在逃战士。终于有一天东窗事发，警察将“我”

逮捕。狱中的“我”不断地反思自己短暂的宪兵生活，总算明白了自己不过是那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在天皇、国家和军队的眼里，像自己这类的普通百姓和士兵始终不过是草丛中的虫豸。

群众出版社

滕新华 译

吊木蓬生著

逃亡

群众出版社

「日」 布木蓬生 著 滕新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亡 / (日) 帛木蓬生著；滕新华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8

ISBN 7-5014-3485-9

I . 逃 … II . ① 帛 … ② 滕 … III . 纪实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7429 号

逃亡

[日] 帛木蓬生 著

译 者/滕新华

责任编辑/孟向荣

技术设计/祝燕君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www. qzcb. com

信 箱/qzs@qzcb.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21.25 印张 604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0—3800 册

ISBN 7-5014-3485-9/I·1483 定价: 35.00 元

关于《逃亡》

两年前，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匆匆赶到东京的惠比寿车站，与一位日本老人见面。寒暄几句后，这位五十年如一日，与丈夫一起献身于日中民间友好运动的老人把这本厚厚的、精装版的《逃亡》递给了我，轻轻地对我说：这本书我看了两遍，很感动。书里的内容也许能够帮助你进一步认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日本、日本人，还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但愿两国民众之间能够多一些理解。

我望着她的满头银发和那略带忧郁而又不失希冀的目光，我似乎感觉到了这本书的分量。回国不久便赶上“非典”，民间对外交往一时中断，我闭门在家，把全书看了一遍，深深地为这位日本作家描述的“战争与生活”所感动。于是，我决意在纪念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时候，将这部长篇巨著介绍给中国读者，让他们通过日本作家的笔触再次了解那场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同时，我也想尽微薄之力，帮助这位日本老人或多或少地实现“两国民众之间能够多一些理解”的愿望。

六十年前，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的后期，正在洗衣店学徒的“我”，婚后不久便应征入伍，随部队驻扎在中国南部的珠江一带。在野战部队，“我”亲历并且不满日军的野蛮行径。在连长的推荐下报考宪兵。在北京经过严格的培训后，“我”以优秀的成绩被派驻香港、广州。其间，“我”渐渐习惯了做一个侵略者、一名宪兵，恪守军人的天职。网罗汉奸，参与缉捕、拷问和杀害敌方谍报人员的行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日军的普通士兵被遣散回国，而将校军官和宪兵则以战犯论处，将被继续关押在中国境内听候审判。鉴

此，就在宪兵团即将受降时，“我”在战友的怂恿下离队出走，隐姓埋名，潜入设在广州的日本人收容所，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逃亡生活。终于，“我”混在日本平民中乘船回国。

当时，日本国内的联合国驻军在日本警察的协助下四处追捕在逃战犯。辗转回到家乡的“我”举家寄人篱下，整天犹如惊弓之鸟，不敢抛头露面。终于有一天东窗事发，警察将“我”逮捕。在带往警察署的途中“我”奋力逃脱，在日本国内继续“我”的逃亡生活。

逃亡途中，令“我”和同伙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年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在村人们敲锣打鼓的欢送下走上战场，九死一生，回到祖国后却遭到本国警察的缉捕，屡遭亲朋邻里的白眼。最后沦落到有家不能归的地步，连年迈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也受到牵连，隔三差五地被传讯到警察署接受盘问。

一年后，饱尝了生活艰辛的“我”，终于忍受不住精神上的巨大折磨，在被警察误作蠹贼抓去审问时，彻底崩溃，主动交待了自己的战犯身份。于是，“我”在警方的同情下进了巢鸭监狱，随时准备押回香港，诉诸法庭。只是由于香港军事法庭的关闭，“我”才得以获释。狱中的“我”不断地反思自己短暂的宪兵生活，总算明白了自己不过是那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国家之忠民”、“天皇之赤子”的宣传徒有虚名，在天皇、国家和军队的眼里，像自己这类的普通百姓和士兵始终不过是草丛中的虫豸。

作家动用大量史料、毫不隐讳地描写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和盟军俘虏犯下的种种罪行。他们灭绝人性把刺杀被捕的乡村抗日游击队当做提高新兵“心理素质”的教材；他们惨无人道地强迫全村男女裸体巡游，取乐后用机枪疯狂扫射，鲜血染红了村边的小河；他们刑讯逼供，将竹签钉进我特工人员的指甲里，在战俘脸上蒙上毛巾，往上浇水，将人活活憋死的场面，令人发指；老人颤颤巍巍，婴儿嗷嗷待哺，祖孙四代站在街门口接受日本宪兵的人口普查时所受的屈辱，催人泪下……

书中还如实讲述了我方谍报人员和抗日志士与日军英勇斗争的

感人事迹，正是由于他们的准确情报，使得敌舰出港后屡遭重创。他们在不幸落入敌人手中以后，威武不屈，慷慨就义。一位英军战俘死不开口，最后竟用撕开的罐头盒割断了自己的舌头。从日本作家的笔下冷静道出的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更为真实，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作者还用日本人的眼光着意刻画了当时生活在我国社会底层的众生相。尤其是通过作者的客观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国难当头一些中国人贪图享乐、卖国求荣、甘当敌人奸细和情妇的卑鄙嘴脸。作者还披露了“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滞留在收容所内的日本人的艰苦生活，中国人民在欢庆抗战胜利时个别中国人对在当地经商的日本平民所实施的报复行为。这些描写在我们国内的作品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本书还以大量的笔墨叙述了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国内生活物资短缺，普通百姓过着贫困生活以及人们萎靡不振的精神面貌。帮助我们认识到，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广大的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

书中借主人公及其家属、参战的其他宪兵之口，向我们传递了日军的下级军官、士兵和日本的平民百姓对这场战争的不同认识和看法。他们中间，认为这是一场为国为民的“圣战”，结果不过是“胜者王侯败者贼”者，有之；责怪天皇在战后软弱无能，不该对战胜国俯首称臣者，有之；本身罪大恶极却在喋喋不休地为自己狡辩，鸣冤叫屈者有之；崇拜中国地大物博，认为日本统治不了中国者，亦有之……书中描写的许多日本人对这场战争存在着模糊或者极端错误的认识，令我们遗憾。反之，也为我们揭示了当前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势力占据上风，国民中民族主义情绪尚存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基础。

小说的主人公是“我”。可是纵观全书，日语中的第一人称——“私”，作者仅仅使用了一次，而且出现在全书的最后一句里。作者将日本语言中微妙的无主句的表达方式利用得淋漓尽致，叹为观止。同时，作者之所以竭力避免直接使用这个“私”字，或许有着他更加深刻的寓意，耐人寻味。鉴于两国语言在语法和表达方式

上存在着这种难以弥合的差异，为方便中国读者阅读，译文没有如实反映原著语言的这一重要特色，特此说明。

在本书翻译和出版过程中，译者得到了东京都涩谷区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坂田和子女士、千代田区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田边惠三先生、日本全印刷工会中央执行委员长谷川和就先生、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日本处刘玉青同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的王森同志、群众出版社的白玉生同志、孟向荣同志的鼓励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译者

二〇〇五年夏

“你说非逃跑不可，有这个必要吗？”

听出我有反对的意思，田中军曹摇了摇头。

“昨天我见到了我的密探。你可能不认识，是我雇的四个密探当中的一个。听他说，香港搜捕宪兵和密探的行动好像已经开始了。他本人也想回连江口去。一个普通的流浪汉回到老家，谁也看不出来。让我感激的是，他说战败以后也继续照顾我。这是他亲口说的，没错。”

田中军曹瞪着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说道。

“可我们在香港做的一切都是一个宪兵应当完成的任务，并没有干那些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我说。

“这个任务本身就糟透了。在战场上杀人也够不成战犯。但是，在战场以外的地方虐待敌国平民就是一种犯罪，我说的是打了败仗以后。这个道理你也明白。”

“香港也是战场？”我问。

香港的确没有坦克，也没有地雷。但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场。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宪兵才驻扎在那里。

“是啊，从某个方面也可以这么看，对于我们宪兵来说就是战场。可话又说回来了，守田，我们面对的那些人是士兵吗？不都是香港政府的官吏，歌舞厅的老板，还有当过警察的那些人吗？”田

中军曹压低了声音，扫了周围一眼。

宪兵教导队狭窄的操场上没有别人，如果有人透过楼房的窗户往外看，也只能看到有两个宪兵在无精打采地修理铁丝网。一种自嘲的感觉从我的脑中掠过。身为宪兵军曹，手里却拿着一把钳子修补铁丝网，这光景本身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战败图。

“还有英军的士兵呢。”我辩解道。

“可他们都是俘虏啊。俘虏不是士兵，粗暴地对待他们等于虐待俘虏。啊，小心点！”

我的指尖一阵刺痛，渗出了血。被修理的铁丝网好像一束束带刺儿的玫瑰，容不得半点马虎。我用嘴吮了一下，血还是没有止住。只好把缠在腰间的三角巾解下来撕成布条，把食指包起来，田中军曹帮我系了一个扣儿。

“这个三角巾别要了，过去都是隔一天洗一回，可现在一用就是一个礼拜。哎，我们说到哪儿了？”他问。

“虐待俘虏。”我回答说。

“对了，对了。怎么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好像都成了别人的事了。”田中军曹皱起了眉头，“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对手不是士兵。”

“他们表面上不是当兵的，可都是重庆政府和八路军的间谍，有的人还是大校呢。”我坚持说。

“可他们没穿军装，一身平民打扮。既然如此，我们等于在杀害平民！”

说到“杀害”两个字的时候，田中军曹的脸有些走形。他嘴上没有出声，可投过来的眼神却分明在说：你和我犯的是一样的罪。

“总而言之，你说来说去，香港就是战场，和我们打仗的敌人也是士兵。我要是否定，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士兵，那咱们俩就没话可说了。”

田中军曹一边说，一边用铁刺儿将两根铁丝连接在一起，然后用钳子灵巧地拧结实。

“你是不是觉得如今打了败仗，修好了也没用。”田中军曹来回寻找着该修补的地方，问我。这话再明白不过了，所以我没有吭声。

“这条铁丝网是用来保护咱们的，如果支那人从缺口里爬进来抢东西，该怎么办？可不能开枪，把他们打死了等于犯了杀人罪。如果你大喊大叫，有人抢劫喽！可这里本来就是人家中国的地盘儿。咱们只好坐以待毙。就这么点儿道理，宪兵团的头头们硬是不懂。不光是当官的，咱们这些当兵的又有几个人明白呢？”

说着，他又发现了一处破绽，猫下腰来把残缺的铁刺儿补上。当宪兵以前他在工兵连呆过，干这种活儿游刃有余。他继续说道：

“八月十五日以后，从军官、下士、一直到士兵，都成了阳光下的雪人，不知道这一天天该怎么过，没着没落的。最近这四五天，连我也没有抓挠了。对待我负责管理的那些学员，还要一本正经地教育他们不能轻举妄动。可究竟应该怎么办，连我也说不清楚。当时上边传来一道命令，要求宪兵团全面负责维持军队秩序。其实这项任务平时也是由宪兵团执行的。再次下达，无非要我们按兵不动，维持秩序，直到军方撤走最后的一兵一卒。”

宣布战败的同时，宪兵团马上采取行动，烧毁一切文件。把所有带字的纸张统统搬到了操场上，扔进了熊熊燃烧的火堆里。仓库管理的记录、出纳和会计的账簿自不待言，区队的名单和奖惩人员的名单都付之一炬。烈火浓烟一直持续到十五日的后半夜。

第二天，也就是十六日。我们6人一组到广东省内进行侦察，发现家家户户都打出了青天白日旗，我们大为震惊。要是在过去，这种旗子一旦发现，人就性命难保了。他们究竟把这些旗子藏在什么地方，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缝制出这么多面。毫无疑问，市民们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早就有所准备，把旗子埋在土里或者掖到了床底下。

街面上，坐马车的和那些骑自行车的人也都挥着小旗，来来往往。没有中国人对我们怒吼，和我们辩论。

“你想想。等我们把军队都送走后，心里想这回该轮到我们动身了吧，于是着手做回国的准备。可人家会轻易地让我们走吗？即便我们坚决要走，可是帮助我们的二十三军已经不在了，我们现在和赤手空拳没什么两样。还有……”

说着，田中军曹又看了看周围。有十几个宪兵团学员来到操场跑

步。为了防备万一，他们个个戴着钢盔，背包里塞满了石块。指挥他们的是佐渡岛曹长，他自己也戴着钢盔，背着背包。

“还有……”

田中军曹止住了话，把钳子和铁刺儿撂在了一边。我们两个人站起来，等那一伙人跑近了以后举手行礼。佐渡曹长也轻轻地回了一个礼，带着学员们跑了过去。

“越是这么拖下去，支那人的感情越是朝着反日的方向发展，你外出的时候也意识到了吧。”

田中军曹说的没错。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进入九月，上边通知南支那派遣军第二十三军解除武装，接着又决定全军撤退。在这种形势下，广州居民看我们，一天不如一天顺眼。

“二十三军都撤光了，市民的怨恨情绪说不定哪一天就要爆发。我们把人家折腾得这么苦，人家能让我们就这么白白地回国吗？难道就不会找我们算账？这种情绪肯定越演越烈。”

“原来是这样。”

他说得如此肯定，我也只好点了点头。

眼下，社会上发生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代金券大跌，有的店铺甚至拒收南京政府发行的代金券。

“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前，一个密探在城里和我联系上了，也是我偶然遇到的。我对同行的轻井说有点事要办，便离开了他，若无其事地追上了刚才向我示意的那个密探。当时我穿着一身显眼的军装，提心吊胆。拐进小胡同，他把我拽到一间小屋里，我们两个人聊了起来。从九月一日起驻港陆海军解除武装的通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的。他非常严肃地劝我，上面已经开始暗察隐藏在广州的战犯了，您最好还是先逃吧。当时我也和现在的你一样，根本听不进去。”

田中军曹叹了口气，大概想起当时自己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

“那个密探还问我，您在顾虑自己的名声吗？您是不是为了维护日本军人的名誉才不肯逃跑的？我没有做声。我虽然没有心思用名誉来概括自己的一切，但也许已经流露出半默认的态度。屋里十分昏暗，我只能看见密探的那张油光光的脸。这个人在战败以前就

为我卖命，现在仍然真心实意地为我担忧。我在看人上是不会有错的。我不动声色地寻思着。这时，你猜他对我说什么？”

我摇了摇头。

田中曹长继续说：“在中国人这个圈子里，自以为清白是行不通的。还有，中国人报仇时一向是趁火打劫。这都是他的原话。就这样，我下了决心。”

从操场上可以看见教导队本部那座钢筋水泥的三层小楼。楼顶上供奉的御盾神社露出了部分屋脊。风物依旧，而留守在大德路上的教导队却宛如漂泊在中国人海中的一叶扁舟。如果人海在顷刻之间突掀狂浪，这艘小船必将无声无息地沉入海底。

“什么时候走？”我问。

“终于下定决心啦？”田中军曹将搬弄钳子的手停了下来，“越快越好。”

“不过，现在逃跑就是开小差，和临阵脱逃一样，要送交军法会严处的。”

“笨蛋！整个日本都败了，日本军还有什么用？根本开不成军法会议。军界的大将军们都在干些什么？想想吧，我说的不是二十三军，是北支和中支。听说咱们的军队要把所有的军需品全部交给国民党军队。作为回报，他们保证让全体官兵回国。换个角度看，这倒是个聪明的办法。我没意见。可这些官兵里并没有包括咱们宪兵。上边只对宪兵下了一道命令，在部队安全回国以前，竭尽全力维持复员时期的军纪，保护日本侨民撤离。所以，部署在内陆地区的宪兵队正在为任务完成以后如何撤离而发愁。和他们比起来，广州的情况也许还不错。不管怎么说，要想离开这里，越快越好。明天下午怎么样？”

“有几个人要走？”我问。

“你和我两个人。这种事儿，人多了不行。”田中军曹说着，直起腰来。

我们沿着铁丝网走到了距离房屋最远的地方。

“你就跟班长说，到街上去侦察一下，这个理由最充分。出去时换上支那服。问题是钱。你手头有多少？”他问。

逃亡

“港币有二百。大概还有一千左右的法币。”我说。

“我也差不多，就是它了。咱们在哪儿会合？两个人一起离开教导队恐怕不好。”他问。

“中山路和越秀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东南角，怎么样？那里离东区宪兵团很近，万一出什么事还可以躲进去。”我说。

“其实离宪兵团太近反而不好，算了，就这么着了。三点，行吗？咱们互相等到四点，如果有谁没到，就先回教导队，以后重新商量。”熊谷曹长拍板道。

佐渡岛曹长带着学员收操了。操场上空荡荡的。

“学员们也没了积极性。”穿过操场，田中军曹说。“好不容易报了名，考试也通过了，却遇上了战败。”

“这种下场也不坏，至少用不着逃跑。”我说。

“倒也是。”

广东的教导队是去年五月成立的。第一期招收了五十人，年底毕业。今年上半年又送进来第二期学员，目前受训的是第三期，共有一百五十人。

“今年，你到广州来是上级安排的吧。当时是不是也不愿意？”我问。

“是的。可原地不动留在香港，人们都认识我，化装成中国人，别人一眼就能认出来。”他说。

半年前的二月，香港宪兵团发布大规模人事调动的命令。有将近二十人被派到广州教导队。相反，广东地区的部分宪兵调到香港。包括其他调整在内，继续留在香港地区的宪兵不足一成。其中的意图虽然没有公开，但是人们不难想出，这是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战败局面而作出一项部署。

“刚回广州的时候还有些恋恋不舍，因为香港毕竟是我最初执行宪兵任务的地方。”我说。

“这么说，城里的情况你也很熟悉了。”田中军曹说话的口气平静了许多。

“那时候，我当宪兵还不到六个月，所以还不会耍什么威风。就在咱们现在正对面的南支派遣军宪兵团本部里。”我说。

逃亡

“我开始在海南岛，那地方也不错。”

我和田中军曹是同学，都是北京教导队的五期学员。毕业以后，同期的学员们各奔东西，大部分分配到驻扎在各地的南支部队。我们再次见面是在现在的这个教导队里。他在离开海南岛以后被招回广州当了特高课的课员。教导队刚一成立，上级又派他到这里当了一名教官。

“好吧，明天见。”

我在台阶下与田中军曹分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一个人住的是双人房间。上下铺外加两张桌子。大衣柜横放在屋子中间，离顶棚不远的地方还镶有一个壁橱。

说到个人物品，除了军装、西服和中国服，只有装在皮箱里的纸币和本子之类的杂物。从香港调到这里来的时候，只留下了皮箱，其他东西都处理掉了。

我把皮箱拽了下来，从里面取出了一个手提布袋。这里面装的东西必须要带走，其他东西只好撇掉。

把油纸包着的法币和港币挪到布袋里，装了这么点东西，布袋就鼓鼓囊囊的了。当我把皮箱放回到壁橱里的时候，楼道里响起了紧急集合的警报。

我走出房间，从外边把门锁好。

五分钟以后，学员和他们的教官共有二百多人在操场上排起了整齐的队伍。

站在台上的是教导队队长东田少佐。

“上级已经决定，南支宪兵团解除武装的时间在明天上午。中午十二点，我们要把所有的武器交给国民党军的宪兵团。关于我们以后的行动，必须等候国民党军的指示。各位师生，我们还有二十个小时，希望大家无怨无悔，完成一个光荣的帝国宪兵及学员所担负的任务。讲话完毕。”

东田少佐有些激动，声音哽咽。

“没想到这么快啊，这种上下不着边际的状态，太受刺激了。”我身边的佐渡岛曹长说。

“说来就来了。”我一边敷衍着，一边搜寻田中军曹。对于这个

突如其来的决定，我们事先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现在必须重新商量，更改计划。我估计解除武装以后不可能再有离队的机会了。

学员和教官们都默不作声地回到楼里。从每一张脸上都能看到无可奈何的感慨：这一天还是来了。

田中军曹正在楼梯下掸着马靴上的泥土，当我走过时，他若无其事地说了句：“一切照旧”。他的声音很低，只说了这么一句，便消失在楼道的深处。

什么时候出去比较合适呢？我立刻盘算起来。今天晚上好，还是等到明天早晨？还有，具体该怎么行动？

回到自己的屋里，我开始整理需要带走的衣物。再也不能一个人穿着军装在广州街头随便行走了，那样会遭到人们的围攻和殴打。如果穿西服，在城里也很显眼，容易被人看出是日本人。恐怕只有穿大褂了。在香港执行特务或宪兵任务时，我几乎每天都是一身中国人的装束，很有自信。从体形和动作上别人绝对看不出我是个日本人。尽管我的广东话还没有达到当地人的水平，不过在说话不多的情况下也常被人误以为福建人。

穿上大褂，我继续考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才能顺利出走。我想起和田中军曹一起修补的那段铁丝网。从没有修补的地方逃出去，倒是个办法。如果深更半夜行动不便，那就等到天快亮的时候，不用手电筒也行。进入九月后，这里一直没有哨兵巡逻。

吃晚饭的时候，我还是心神不定。大家分班围坐在饭桌前默默地嚼着。白米、咸萝卜、蛤蜊汤、直到煮鱼，和平常的伙食没有多大区别。不过，今晚新添了一道八宝菜。看来炊事员也想到了，这是解除武装前的最后一个夜晚。

这道特意奉献的菜肴无法遮掩学员们对明天的担忧。他们和初来乍到的那天一样，嘴巴的动作很不自然。

身为班长的饭野曹长和其他教官同样顾虑重重。我突发奇想。他们中间是否有人也在考虑怎样离队的问题呢？

何去何从，先要把自己的过去放在天平上。作为一个宪兵，我都干过些什么。如果没干什么，没有在“宪兵”这个特有的职业上铤而走险，就没有离队的必要。

饭野曹长来教导队之前在二十三军宪兵团本部警务课工作。尽管他训导学员时态度和蔼，可我还是能够从侧面看出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宪兵。他在学员们面前表演捕绳术时，手上的功夫干脆利索。如果不是久经沙场的一员老将很难达到这种水平。

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不是也同样在考虑离队的问题吗？我脑子涌现了这一个莫须有的邪念。看来不只是他，那些举足轻重的下士们难道就没有暗中策划逃亡吗？我越发觉得食堂里的空气之所以如此沉闷，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假如教导队里有十来个人同时离队出走，这可是个重大事件。如果同样的事件在广州市内的宪兵团本部、在中央区宪兵团、在东部和西部的宪兵团，进而在珠江河南岸地区的宪兵团均有发生，形成的将是一场大规模的动乱。所面临的将不再是解除武装，而是国民党军队对宪兵团的全面讨伐。

离队以后如果不幸被国民党军抓住，下场如何呢？等于对以前的罪恶行径不打自招。人家会以畏罪潜逃的罪名严刑拷打。即便移交法庭审判，在这种让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恐怕也很难免于极刑。

如此看来，只有心甘情愿地解除武装才是上策？不，这也不是办法。解除武装以后还要被追究战犯责任，继续留在队里就像一群雌雄待辨的鸡雏。一旦辨认为雄的，被人家脖子一拧，上了西天。

我左思右想，手里的筷子变得迟钝起来。

“班长，谢谢您的关怀。”一个学员突然站了起来。其他人也都跟着他起立。

“今后，我们也要牢记班长的教诲！”

意外出现的一幕，惹得外班的学员都往这边看。

“知道啦。都给我坐下。在这种场合不许这样。”饭野曹长冷静地制止大家，十三个学员总算坐了下来。有三四个人在不停地抽泣。

这些人都是从各个师团推荐上来的，通过宪兵教导队的考试，合格以后刚开始受训，就赶上了战败。惋惜的心情说不定比那些老兵们还要沉重。

等学员们安静下来以后，饭野曹长安抚似的看着每一个人。

随着一声号令，晚饭结束了。曹长把第一区第二班的学员留下来。

“今天晚上，不必像平时那样写当日总结。我已经向区队长报告过了。八点的晚点名取消。这就是说，九点钟熄灯的号声吹响以前全部为自由活动时间。”

如果在平时，他们肯定要欢呼雀跃一番，可眼下他们表情严肃，正视前方。

“守田军曹，你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吗？”

班长临时点到了我，可我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

“从明天中午起，你们身为宪兵学员，一名日本军人的生活将告结束。”

我先说了这么一句，同时寻找着其他适当的言辞。我是副班长，可又是这十三个人的教官。此时，我心里想的是，我以教官的身份面对大家讲话的机会，今后还会再有吗？

“我希望大家从此以后能够挺起精神，返回国内，返回家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半月，我们应当为自己曾经做过宪兵学员而感到自豪。将来，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努力。我想重复一遍，一定要精神饱满地回国去。”

“守田军曹的讲话完全表达了我的心情。”饭野曹长巡视着学员们，说道。“不要流泪。大家表现都很好。我认识的学员中你们是最优秀的！”

就在上一届学员毕业时的6月，饭野军曹也是这样鼓励他们的。“你们是最优秀的”。除此以外，恐怕再也没有其他的表达方式更能让这些毕业生充满自信。这里渗透着饭野曹长的为人。看来宪兵组织的上层至少在教官的选派上颇有眼光。

饭野曹长行了一个军礼。望着他离开的背影，我很想告诉他自己明天早晨就要离队了。然而我又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果告诉了他，估计他不会制止，但是，知情不举的罪名必定要落到他的头上。

“守田军曹。”